

# 东亚经纬

2022年第4期

## 【本期要目】

◆观察与思考.....	1
中日汉字书写应用差异(刘潇雅).....	1
《荣花物语》中的娥子立后考(彭溱).....	4
新“安保三文件”与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许寿童).....	11
日本半导体企业发展机遇及生存策略(尹虎).....	17
韩国文化软实力提升政策简析(权承文).....	23
◆学术动态.....	28
◆征稿启事.....	34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2022年12月31日

## 中日汉字书写应用差异

——以“碗”的异体字及通用现象为例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 刘潇雅

日本的文字发展受到了中国汉字的极大影响。隋唐时期，中日交流频繁，大量的中国古典文献传入日本，汉字不论正体、俗体，皆一同被日本古代文人认识并加以应用，同时，两国文化的差异也势必会导致在应用过程中产生各自的选择和发展。现今中国，饭碗、茶碗皆以“碗”字表记，但在日本，则有饭“椀”，茶“碗”之分。乍看可简单将其归结为原材料不同在文字上的体现，但字体的演变并非一蹴而就，其发展、变化轨迹背后亦有深刻含义。中国自古以“盥”为“碗”字正体，曾在漫长的历史中将此二字为基本表记法；而日本则少见“盥”的实际使用例，反而广泛使用“碗”“碗”“碗”“碗”等俗体字，室町中后期开始出现将“椀”作为一般表记、“碗”以固定词组“茶碗”出现的倾向，而在制瓷技术普及后的江户时代，“碗”才开始作为常用表记使用。本文主要对中日两国历史文献中“碗”的书写方式及通用现象进行梳理，旨在以此为基础，探明中日两国文字书写应用上的差异及其背后的成因。

### 一、汉字的正体与异体

异体字在《说文解字》中被称为“重文”，其历史可追溯至甲骨文时代，所谓“形体多样，异体繁多”，使用状况非常混乱。至唐代，颜元孙撰《干禄字书》，一度成为汉字使用的规范，清代编《康熙字典》，进一步对用字规范进行了完善。一般来说，异体字指隶属于同一字体、发音和语义两方面完全相同的文字。对应“正体”的文字称为“俗体”。“正体”和“俗体”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下成立的概念，清代王筠在《说文释例》中曾言：“累溯而上，一时有一时之俗”，可见不同历史时期，正体字和俗体字的位置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

以本文考察的“碗”字为例，虽然在历史上，“碗”为俗体，“盥”为正体，但随着时

代变迁，在中国，其两者位置已经互换，“碗”无疑已成为被现代汉语选出的唯一表记。

在日本，《日本国语大辞典》列举出的餐具“ワン(wan)”的相关表记有“盥”“椀”“碗”三种。通过“闻藏”(可检索朝日新闻1984年以后内容的数据库)、读卖新闻数据库以及“ひまわり”(国立国语研究所开发的全文检索系统)检索可知，近代以来，日本以“椀”“碗”二字为常用汉字，但“碗”的使用例中，近80%的使用例为“茶碗”，且日本工业规格《情报交换用汉字符号》JIS X0208-1990中明确记录“碗”为“椀”的异体字。与将“碗”作为正体使用的现代中国相比，日本选择了将“椀”作为正体使用，同时保留了“茶碗”的固定用法。

## 二、中日两国古代文献中“碗”的写法及通用现象

《说文解字》记载：“盥，饭器也”“盥，小盥也，乌管切”。《广韵》解释“椀”为“器物 乌管切 盥 上同”，《集韵》将“甃、埳、椀”作为“盥”的异体字收录其中，《中华大词典》称“碗，盥俗字”。在中国，曾以“盥”为正体，同时存在“盥”“碗”“椀”“埳”“甃”“碗”五种同系统的汉字表记。“甃”不在其中，为锄头曲铁之意。音符换成“完”时，“椀”“埳”“甃”分别有自己独立的含义，皆未见表示其为“盥”异体字的明确记载。

利用北京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的检索系统“国学宝典”进行筛查可发现，在中国，对“碗”的基本表记法一直固定于正体“盥”和俗体“碗”(共1678例)，虽有“椀”的使用例，但和前两者相比数量极为稀少(仅38例)，“甃”仅限于《搜神记》中可见(6例)，可初步判断在中国并未将其作为“盥”的异体字使用。《集韵》中列为“盥”俗体字的“甃”“埳”二字，管见所及，并未查到其使用例。“椀”代表饮食器皿的仅有一例，和“埳”一样，与“盥”无直接关系。

而日本的使用情况较为复杂。从古辞典来说，平安时代的古辞典中，《新撰字镜》收录了“椀”字，同时注明“甃”为农具，“椀”为“木名”，基本与中国古辞典中的解释相同。《观智院本类聚名义抄》中收录了“椀”“埳”二字，但前者释为“断木”，后者释为“土器”，也未将此二字视为“盥”的异体字。

而《色叶字类抄》和《世俗字类抄》则将之前未作为饮食器具解释的“椀”“埳”归为“杂物”部，赋予了餐具之意。《色叶字类抄》中收录的文字多为平安末期撰写汉文体文章时的必要用语，侧面反映了当时古文书和古记录中的情况。中世成立的诸本《节用集》中收录的表记法基本以“椀”为主，出现其他表记法时，一般也以“同椀”来解释。江户后期的《笺注倭名类聚抄》中针对“盥”“甃”二字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注解，提到：“玉篇，

盃亦碗，盖俗以木盃，故作碗也。其磁盃作碗，金盃作碗，与木牒子作牒，磁牒子作碟，其义同”，提示了表记法偏旁和制造原材料之间存在关系的可能性。

日本的古典文献中更能看到“碗”字相关表记法的多样性。通过考察古文书（《平安遗文》《南北朝遗文》《镰仓遗文》《大日本古文书·编年文书》《大日本古文书·家わけ文书》）中检索出的相关汉字使用例 487 例、古记录（《小右记》《玉叶》《吾妻镜》《萨戒记》《建内记》《九条家历世记录》《上井觉兼日记》）中检索出的相关汉字使用例 249 例，以及古典文学中检索出的相关汉字用例 109 例可发现：奈良时代，日本表示饮食器具“ワン（wan）”的常用汉字表记主要有六种，分别为“碗、碗、碗、碗、碗、碗”，管见所及，未见正体“盃”字的实际使用例；奈良时代以土字旁或金字旁+音符“宛”的表记法为主；“碗”“碗”的使用例集中于奈良、平安时代，平安时代以后此两种表记法完全消失；室町时代出现“碗”的表记法，但仅存于《东寺百合文书》中；室町时代中期开始，表记法逐渐固定为“碗”和“碗”，并出现了一般表记时用“碗”，表示“茶碗”时用“碗”的倾向；少数文献中出现了“𠄎宛”“𠄎碗”等表记法，结合前后文字看，可推测是为了与前后文字的偏旁统一，而选择了相同偏旁，属于日本书写中的“偏揃”现象。

在中国，并未将“碗”作为“盃”的异体字，日本古辞典中虽然也记有“宜用金碗二字，碗字未详”，但从平安时代开始，此字一直表示餐饮器具，无疑，在日本是将其作为“盃”异体字来使用的。“碗”“碗”二字在《类聚名义抄》中并未记载有饮食器具的含义，其用例也集中出现在中世的古文书和古记录，特别是《东寺百合文书》及《吾妻镜》中，不排除有书写者个人习惯的因素影响，是否可将其视为“碗”“碗”的异体字，尚不能妄下定论。

### 三、中日书写差异的形成原因

中国早在六朝时期就进入了完全的瓷器时代。瓷器制作工艺成熟，造价相对低廉，由于其轻巧、美观、好清洗的特性，作为餐具无疑是首选。中国自古以来以“盃·碗”为常用表记，也是中国工艺技术和饮食文化在文字上的体现。

日本的饮食器具发展过程与中国不同，结合《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研究报告》等考古发现资料来看，在日本，餐饮器具汉字表记的选择与当时使用器具的材质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平安时期作为贵族用品、佛教器具的“银碗”“白铜碗”“金碗”，平安时期开始共存至今的土器“碗”和漆器“碗”，在江户时代才开始普及使用的瓷“碗”、茶“碗”，不同时代所使用的器皿材质、特色不同。而不同时代的文字记录者，并非单纯遵循前人的表记法，而是对应不同时代的实际情况，选择了与时代相符的文字书写方式。

同时，日本古典文献中常见的“偏揃”现象也是日本出现异于中国表记法的原因之一。

# 《荣花物语》中的娥子立后考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彭 溱

在《荣花物语》卷十中，三条天皇的妃子藤原妍子、藤原娥子相继于长和元年（1012）二月、四月立后，出现了“一帝两后”的局面。妍子为当时诸臣之首左大臣藤原道长的女儿，娥子为已故大纳言藤原济时的女儿，在家境上，娥子不如妍子。但娥子比妍子早入宫近 20 年，在三条天皇尚为太子时，于正历二年（991）便入东宫，立后时已有四儿两女。而年纪小很多的妍子，则是在三条天皇即位两年前的宽弘六年（1009），才入东宫，立后时尚无子嗣。两人各有优势，但在摄关政治时期，摄关家的女儿妍子明显更具政治背景，实际上也先于娥子获得后位。值得注意的是，《荣花物语》在描写两人立后时，有一处明显与史实不符，即：藤原道长主动向三条天皇提议需立娥子为后，当三条天皇因娥子父亲官位过低在娥子立后一事上犹豫不决时，更是积极献策，提议追赠藤原济时为太政大臣，于是娥子顺利立后。藤原道长是否真的曾向三条天皇提议立娥子为后，无从知晓，但追赠藤原济时太政大臣的叙述，与史实是有出入的。追赠确有其事，但所赠之官并非太政大臣，而仅是右大臣。本文拟从藤原济时获赠太政大臣这一叙述，考察《荣花物语》中娥子立后的叙述逻辑。

## 一、“赠太政大臣”的政治意义

《荣花物语》为何将藤原济时的“赠右大臣”改作“赠太政大臣”，要考察这个问题，需先明确“赠太政大臣”行为的政治意义。

首先，“太政大臣”一职，在日本确立律令制度后的《职员令》中规定为：師範一人、儀形四海、經邦論道、變理陰陽、無其人則闕（井上光貞ほか校注『律令』新装版，岩波书店，1994年，158页）。即天皇之师、一国典范、治国论道、辅佐理国、无合适人选则空缺之意。其中，“師範一人、儀形四海”、“經邦論道、變理陰陽”分别与唐令中的“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规定相近，因此有日本学者认为，太政大臣兼备三师、三公的属性，同时指出，太政大臣并没有被赋予具体职权，所以仅是象征地位的官衔（前引井上光貞等校注《律令》新装版，513页）。对此，桥本义彦根据《续日本纪》的记载、有关《令义解》的各家研究等相关材料，指出律令制中的太政大臣不仅仅是名誉官职，而是确具“师范训道”“总摄万机”两方面的性格（橋本義彦「太政大臣沿

革考』，『平安貴族』，平凡社，1986年）。“总摄万机”的性格与统掌万机之政的摄政、关白的性格相通。

实际上，日本皇族之外的首位摄政——藤原良房，最先是被提拔为太政大臣，以辅佐当时年仅8岁的太子惟仁亲王。翌年惟仁亲王即位后，良房继续以太政大臣的身份辅佐幼帝，得摄政之诏是在8年之后。如桥本所说，“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说，可以认为良房的太政大臣任命才是人臣摄政制的起点”（前引桥本义彦《太政大臣沿革考》，129页）。良房之后，其养子藤原基经（时任右大臣）也于贞观十八年（876）成为摄政，辅佐刚即位的幼帝阳成天皇。

4年之后，基经被任命为太政大臣，任命的诏书里提到：基经现在的右大臣之官，与摄政之职不相称，故提拔为太政大臣（武田祐吉·佐藤謙三訳『訓読日本三代実録』復刻版，临川书店，1986年，898页）。可见，太政大臣被看作与摄政相称之官。基经之后，直到圆融天皇时代的藤原赖忠，历任摄政、关白都兼任太政大臣，没有摄关以外的人得以获任太政大臣。但自一条天皇时代的藤原兼家起，摄关与太政大臣开始分离，太政大臣逐渐名誉头衔化，没有担任摄关的藤原氏长老也能成为太政大臣。但即使如此，天皇成人之时，摄政大臣仍会先就任太政大臣，才为天皇行冠礼。可以说，在摄关政治时代，太政大臣与摄政之间的关系是难以割裂的。

那么，“赠太政大臣”的行为有什么意义呢？笔者根据日本的六国史、《日本纪略》、《扶桑略记》、《公卿补任》等史料，统计了至《荣花物语》所述时代（截至1092年）的赠太政大臣事例，如下页表1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除了理由不详的事例外，追赠的理由主要有被追赠者为皇室外戚或功臣、权臣之请、神谕等。其中，因皇室外戚的身份而被追赠太政大臣的事例所占比重最大，且这些事例中，被追赠者多为天皇的外祖父、外曾祖父。

对于追赠外戚的行为，北村有贵江认为，桓武天皇追赠外曾祖父纪诸人为太政大臣有强调自己皇位正当性的意图，并指出其追赠诏书中的“春秋之义，祖以子贵”沿袭了《春秋公羊传》中“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思想，桓武天皇追赠外戚的行为正是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北村有贵江「贈官としての太政大臣—摂関制成立の前史として—」，『寧楽史苑』，45号，2000年）。天皇利用“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原理，对外戚进行追赠，既提高了外戚家族的地位，又强化了自身皇位的正当性。

而为什么在追赠的时候选择授予太政大臣一职，则可以考虑以下两点。首先，太政大臣是太政官中的最高官职，且如前所述，兼具“师范训道”“总摄万机”两种性格，后者虽在藤原兼家以后逐渐淡化，但前者仍在摄关政治时代持续发挥作用。

表 贈太政大臣事例

被追贈者	逝世年	追贈年	生前官職⇒贈官	追贈理由
1. 藤原鎌足	669、天智朝	不詳	内大臣⇒贈太政大臣	不詳
2. 藤原不比等	720、元正朝	720、元正朝	右大臣⇒贈太政大臣	功臣且为皇室外戚
3. 舍人亲王	735、圣武朝	735、圣武朝	知太政官事⇒贈太政大臣	不詳。可能因其为曾辅佐圣武天皇的皇室长老
4. 藤原武智磨	737、圣武朝	760、淳仁朝	左大臣⇒贈太政大臣	太师藤原仲麻呂之請
5. 藤原房前	737、圣武朝	737、圣武朝	参议⇒贈左大臣	不詳。但其为圣武天皇的舅舅
		760、淳仁朝	⇒贈太政大臣	太师藤原仲麻呂之請
6. 纪诸人	709至779期间	785、桓武朝	内藏头? ⇒贈太政大臣	桓武天皇的外曾祖父
7. 橘奈良麿	757、孝谦朝	年份不詳、仁明朝	参议⇒贈大納言	不詳。可能因其为仁明天皇的外曾祖父
		847、仁明朝	⇒贈太政大臣	仁明天皇的外曾祖父
8. 藤原真楯	766、称德朝	766、称德朝	大納言⇒贈太政大臣	不詳
9. 藤原永手	771、光仁朝	771、光仁朝	左大臣⇒贈太政大臣	功臣
10. 藤原良继	777、光仁朝	806、平城朝	内大臣⇒贈太政大臣	平城天皇的外祖父
11. 藤原百川	779、光仁朝	783、桓武朝	参议⇒贈右大臣	不詳。可能因其曾辅佐亲王、东宫时代的桓武天皇
		823、淳和朝	⇒贈太政大臣	淳和天皇的外祖父
12. 藤原种继	785、桓武朝	785、桓武朝	中納言⇒贈左大臣	被暗杀，桓武天皇悼惜
		809、平城朝	⇒贈太政大臣	不詳。可能是其女藤原药子促成的追贈
13. 橘清友	789、桓武朝	839、仁明朝	内舍人⇒贈太政大臣	仁明天皇的外祖父
14. 藤原冬嗣	826、淳和朝	850、文德朝	左大臣⇒贈太政大臣	文德天皇的外祖父
15. 藤原長良	856、文德朝	877、阳成朝	权中納言⇒贈左大臣	阳成天皇的外祖父
		879、阳成朝	⇒贈太政大臣	阳成天皇的外祖父
16. 藤原总继	811至839期间	885、光孝朝	不詳⇒贈太政大臣	光孝天皇的外祖父
17. 仲野亲王	867、清和朝	887、宇多朝	太宰帅⇒贈太政大臣	宇多天皇的外祖父
18. 藤原高藤	900、醍醐朝	900、醍醐朝	内大臣⇒贈太政大臣	不詳。可能因其为醍醐天皇的外祖父
19. 菅原道真	903、醍醐朝	923、醍醐朝	太宰员外帅⇒原官右大臣	道真怨灵作祟
		993、一条朝	⇒贈左大臣	神諭
		993、一条朝	⇒贈太政大臣	神諭
20. 藤原时平	909、醍醐朝	909、醍醐朝	左大臣⇒贈太政大臣	不詳。但其为皇室外戚，即东宫保明亲王的舅舅
21. 藤原道兼	995、一条朝	995、一条朝	关白右大臣⇒贈太政大臣	不詳。但其为一条天皇的舅舅
22. 藤原能信	1065、后冷泉朝	1073、白河朝	权大納言⇒贈太政大臣	白河天皇的外祖父

其次，太政大臣的地位本就与外戚密切相关。自摄关政治初期的藤原良房至末期的藤原师实为止的历任太政大臣中（除去被追赠者，总共 15 名），除藤原赖忠、藤原公季、藤原教通、藤原信长 4 人，全是天皇外戚。桥本指出，太政大臣的“师范训道”的性格与外戚辅佐天皇的立场相通，天皇外戚之身份自然能成为就任太政大臣的理由之一（前引桥本义彦《太政大臣沿革考》，134 页）。正因为太政大臣是外戚经常担任的重要职位，对于想对外戚进行追赠、提升自身正统地位的天皇来说，追赠太政大臣应是最为便捷有效的选择。

## 二、娥子立后的叙述逻辑

追赠外戚太政大臣的行为，其主要政治意义在于强化皇位的正当性，巩固皇权。从这种视角来看，《荣花物语》中娥子父亲藤原济时的赠太政大臣事例，似乎不符合这种逻辑。作品中藤原济时被追赠为太政大臣，是因娥子立后的需要。藤原济时生前的官职止于大纳言，三条天皇因近世没有纳言之女立后的先例，担心娥子立后遭到反对，于是藤原道长向三条天皇提议追赠藤原济时为太政大臣。这种因立后需要的赠太政大臣，如前述表 1 所示，并没有实例。而实际上，给予藤原济时的赠官也不是太政大臣，而是右大臣。那么，《荣花物语》将“赠右大臣”改作“赠太政大臣”，有什么深意呢？接下来，从作品中的立后条件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关于《荣花物语》中的立后条件，福长进曾做过详细论述，指出藤原氏女性的立后条件为：摄关之女或育有皇子（福长进『『荣花物語』続編の歴史叙述—立后と摂関継承問題をめぐって—』，加藤静子·福长进编『日本文学ジャーナル第 6 号 歴史物語の表現世界』，古典ライブラリー，2018 年 6 月）。娥子的情形属于后者，即育有皇子。在作品中，因育有皇子而立后的还有醍醐天皇之后藤原稳子，村上天皇之后藤原安子，以及一条天皇时期的太后藤原詮子。稳子、安子、詮子、娥子 4 人因同样的条件而立后，但娥子的背景是最弱的，其他三人都属掌权的藤原北家主流派，唯独娥子是旁支出身。这样看来，娥子的立后，更值得探究。

首先探讨一下稳子、安子、詮子 3 人的立后原委。稳子立后于延喜二十三年（923），当时稳子的哥哥藤原忠平为藤原氏之首，执掌朝政。立后之前的同年三月，稳子之子、太子保明亲王逝世，醍醐天皇因丧子之痛罢朝 3 日，并认为保明亲王的早逝源于菅原道真怨灵作祟，于四月二十日下诏恢复已故菅原道真右大臣之官并追赠正二位。然后于同月二十六日，立女御稳子为后，3 日后，又立保明亲王长子庆赖王为皇太子。可见，稳子的立后，不仅有强大的家族背景支撑，更是与皇位继承问题密切相关。在稳子之前，立后的通常做法是，皇子即位后，其生母立为皇太后。为了册立新太子而实行的稳子立后，与以往的立



后事例性质明显不同。

其后的安子也与稳子一样，是在太子即位之前立后的，不过，稳子立后在立太子之前，而安子立后在立太子之后。天历四年（950）五月，安子生下村上天皇的次子宪平亲王，同年五月，宪平亲王被立为皇太子。8年后的天德二年（958），安子获封皇后。无论是宪平亲王早早成为太子，还是8年后的安子突然立后，都值得思考。关于前者，宪平亲王诞生的同年，藤原元方之女藤原祐姬先于安子生下皇长子广平亲王，但藤原祐姬一派的势力远不如大伯、父亲分别为左、右大臣的安子一派，宪平亲王成为太子，合乎时局。而关于8年后的安子突然立后，可能与诸史料所载宪平亲王的精神异常有关，《荣花物语》中也经常提到宪平亲王精神有异，并将这种异常归结为藤原元方的怨灵作祟。可能随着宪平亲王的成长，其精神上的异常日益明显，为了巩固其太子之位，立其生母安子为后。又或者是，考虑立安子所生其他皇子为太子，而提前立安子为后，以做铺垫。事实上，安子所生五皇子守平亲王也在宪平亲王即位后，成为了皇太子。不管如何，安子立后应与稳子立后一样，既有家族势力的支撑，又与皇位继承问题脱不开关系。

这种关系在之后的诠子立后上，更为明显。诠子在所生皇子即位后，即一条天皇时期才得以立后，成为皇太后。在一条天皇之前的圆融天皇时期，关白藤原兼通之女藤原皇子最先立后，皇子立后时没有子嗣，是凭前述摄关之女的立后条件成为皇后的首例。皇子死后，新任关白藤原赖忠之女藤原遵子也凭摄关之女的身份立后。遵子与诠子在皇后皇子去世前一年的天元元年（978），同年入宫，当时皇子父亲前关白藤原兼通已经去世，与藤原兼通交好的遵子父亲藤原赖忠继任了关白之位。天元三年（980），诠子生下皇长子。但天元五年（982），圆融天皇仍选择册立无所出的关白之女遵子为后。对此，高桥麻织认为，诠子的父亲藤原兼家手中握有冷泉天皇一脉的3个外孙（诠子的姐姐超子与圆融天皇的哥哥冷泉天皇之间生有3名皇子），圆融天皇为维护自己的皇统，对藤原兼家持有警惕心（高桥麻织『『荣花物語』円融天皇による遵子立后—摂関職と皇統の問題から—』、『物語研究』，10号，2010年3月）。如此，尽管诠子育有圆融天皇的唯一皇子，却没有在圆融朝册立为后，而是所生皇子继承皇位后，才得以立后。

综上所述，稳子、安子、诠子三人的立后，虽然具体情况各有不同，但共通的是，都有强有力的家族背景，且都与皇位继承问题相关。以此再来看娥子立后的话，首先可以发现，娥子并没有深厚的家族背景。其父亲在17年前就已去世，并且止步于大纳言的官职，其弟弟藤原通任在仕途上也并不顺利（池田尚隆『『荣花』と『源氏』と『小右記』—藤原娥子記事を中心に—』、『山梨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報告第一分冊人文社会科学系』，39号，1988年），不足以成为娥子的依靠。娥子最大的优势在于她生下了4名皇子和2名皇女，并且与三条天皇有着多年的夫妻情分。在《荣花物语》卷十中，藤原道长向三条天皇提议应先立娥子为后时，藤原道长给出的理由也是娥子入宫多年且生有多名皇子皇女，虽因三条天皇

的坚持，藤原道长的女儿妍子率先立后，但心思巧妙的道长之后屡次入宫，请天皇册立育有多名皇子皇女的娥子为后。比起前述的稳子、安子、诠子立后，娥子立后虽缺少家族背景的支撑，但育有皇子皇女这点，成为其最大的依据，《荣花物语》中也一直强调这个依据。也就是说，娥子立后与娥子所生皇子皇女，尤其是所生皇子，有着莫大的关系。那么，可以说，与稳子、安子、诠子立后一样，娥子立后定然也与皇位继承问题脱不开关系。

这样再来看作品对娥子父亲的赠官改写的话，就能推测其改写意图了，即作品将原本的“赠右大臣”改作“赠太政大臣”，不仅仅是让娥子立后显得更为合理，也是在暗示娥子所生皇长子——敦明亲王之后立太子、甚至即位的可能性。上节论述了追赠太政大臣与皇位的正统性之间的关系，作品中将敦明亲王的外公追赠为太政大臣，赋予了敦明亲王继承皇位的正当性。《荣花物语》中的娥子立后叙述，虽然表面上没有涉及皇位继承问题，但在深层上是与作品中的皇位继承问题相关联的。

### 三、藤原道长的人物形象

在《荣花物语》中，对藤原济时的太政大臣追赠，既促成了娥子立后，也为后来敦明亲王的立太子埋下了伏笔。但不得不思考的是，在作品中提议此追赠的人是与娥子争宠的妍子的父亲藤原道长，理应与娥子处于对立面的藤原道长为何会如此支持娥子母子，在娥子立后叙述中的藤原道长形象是否符合作品整体的逻辑。

作品中藤原道长的形象，在卷十三的敦明亲王辞太子位的叙述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文中对敦明亲王辞太子位的描写大致为：敦明亲王玩心很重，备受太子身份的拘束，向往以前自由的生活，深感煎熬，向母后娥子表明辞太子之意，遭劝阻，转而派人向藤原道长传达退位之意，同样被劝阻，于是再三要求与藤原道长当面交谈，后者应允后，敦明亲王当面向藤原道长倾诉自己不喜太子之位、只想退位做个闲散太上皇，终得藤原道长的同意，如愿辞去太子之位。在作品中，藤原道长与娥子的立场一致，都强烈反对敦明亲王辞太子位，且两人劝阻时的话语也几乎没有差别，都说道：敦明亲王请辞的话，已故三条天皇的皇统就会断绝，万万不可，定是怨灵作祟才会让敦明亲王有此不该的想法。

《荣花物语》将藤原道长塑造成顾全大局、对娥子母子也施予援手的形象，但实际上，据其他史料记载，藤原道长从一开始就不赞成立敦明亲王为太子。据《小右记》长和四年（1015）十二月二十四日条记载，禅位前的三条天皇决定立敦明亲王为新太子，藤原道长远言间流露不满。《小右记》长和五年（1016）正月十九日、二十六日的记载中讲到，在敦明亲王东宫属官的任命上，三条天皇想任命藤原道长之子为东宫大夫，但藤原道长拒绝并让藤原显光（敦明亲王的岳父）、藤原通任（敦明亲王的舅舅）分别担任东宫大夫、东宫傅，

以藤原怀平为首的其他朝臣对东宫属官的任命也避之不及。藤原道长拒绝成为敦明亲王的助力，对此，有日本学者认为，藤原道长意欲使敦明亲王孤立化（大津透·池田尚隆編『藤原道長事典—御堂関白記からみる貴族社会—』，思文阁，2017年，148页）。

《荣花物语》塑造的藤原道长形象显然与上述史实相差甚远。作品中的藤原道长是世人拥戴的朝廷支柱，为了朝廷鞠躬尽瘁，在三条朝伊始、冷泉上皇驾崩、三条天皇禅位等相关叙述中，藤原道长都是肩负重任、来回奔走、辅佐照料天皇、太上皇、太子及其他皇室成员的国之栋梁形象。正是因为《荣花物语》对藤原道长有这样的定位，敦明亲王辞太子位、娥子立后等叙述中的藤原道长形象虽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但在作品中却是符合逻辑的。卷十中有关藤原道长提议追赠藤原济时为太政大臣、极力促成娥子立后的叙述，也因作品塑造的藤原道长的理想形象，而显得自然合理。可以说，娥子立后的叙述逻辑，是《荣花物语》在赞美藤原道长时所采用的叙事手法的一个缩影。

# 新“安保三文件”与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

海南三亚学院政治系 许寿童

2022年12月16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修改后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備计划》等三份安全保障文件，决定日本要拥有反击能力，彻底增强防卫力，并就如何实现打击敌方导弹发射基地在内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达成了共识。

日本多数媒体指出，岸田文雄政府此次调整国家安保战略文件力度前所未有，为战后以来首次，标志着日本防卫政策出现重大变化。文件一经曝光，日本国内外反对之声立现。分析人士指出，未来数年日本“专守防卫”原则或将发生重大变化，东亚地区安全稳定形势将受到严重破坏。

从长远来看，日本此举也有很大的战略图谋，不仅意图进一步突破和平宪法禁锢，实现军力向外扩张，而且还希望以此提升日本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为未来介入全球事务、实现军事政治大国目标铺路，但这种做法不仅会使自身背负沉重的防卫开支负担，也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 一、从“守”向“攻”的转变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系2013年出台以来首次修订。《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備计划》是依据新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分别取代原有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備计划》。这三份文件决定了今后5至10年日本安保和防务政策方向。

从三份文件的主要内容看，日本的安保理念和防务政策将发生重大转折，特别是将彻底放弃作为日本战后核心防务理念的“专守防卫”原则。在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日本政府明确宣称，应拥有所谓“反击能力”，也就是此前所称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主要包括各类远程攻击性导弹以及与美军共同运用的“综合防空与导弹防御”系统。

日本为此将在今后5年采购和装备大批美国“战斧”式巡航导弹和射程1000公里以上的国产改良型“12式”岸舰导弹等，还将开发高速滑翔弹和高超音速导弹。日美军事同盟也将发生新的变化，从原先日本为“盾”、美国为“矛”的“日守美攻”转变为“齐攻齐守”。

尽管三份文件在定义“反击能力”时添加了“必要最小限度”等字眼，但日本舆论普

遍认为，获取“反击能力”将从根本上颠覆日本战后安保理念。日本山口大学前副校长纘纘厚指出，新版安保三文件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大转折，放弃了“专守防卫”，事实上可以决定实施“先发制人攻击战略”。这无疑将给东亚各国带来重大威胁，是一种“新军国主义”。

与防卫理念根本转折相配套，三文件不少内容突破了日本战后诸多军事禁忌。继此前安倍晋三政府放松日本作为“和平国家”招牌之一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将其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此次三文件又进一步放宽扩大武器出口，并提出深化军民一体化的一系列举措。

为达成扩军目标，三文件将 2023 至 2027 年度日本防卫费总额定为约 43 万亿日元（约合 3130 亿美元），是现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9 至 2023 年度）约 27 万亿日元总额的近 1.6 倍，并规定要在 2027 年度实现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而此前日本一直基本遵循这一比例不超过 1% 的标准。是否坚持这一标准也被舆论普遍视为检验日本是否奉行和平主义的一项关键指标。

此外，为实现军事转型，三文件还提出对自卫队组织架构、军种设置、部队编制、军力部署等实施全面调整，包括新设“统合司令部”一体化运用陆海空部队，新设防区外导弹部队，将航空自卫队改为“航空宇宙自卫队”以强化太空战力，为陆海空自卫队全部配备无人机部队，扩大自卫队网络防卫队编制，强化西南诸岛军力部署并组建“冲绳防卫集团”等。

值得注意的是，为给安保政策转向和扩军备战找借口，三文件还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战略挑战”。日本军事评论员前田哲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在三文件渲染“中国威胁论”、大幅调整防卫政策的背后，既有美国推动的因素，也有日本谋求自身军事松绑、成为所谓“正常军事大国”的意图。

在此次修订的《国家防卫战略》中，日本设定了三大防卫目标，即“不允许凭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与盟友抑制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和“负起主要责任，阻止并排除对日本的进攻”，同时阐述了从 2023 年开始未来五年内有关加强国防力量的预算详情。

主要内容包括将旨在提高持续战斗能力的弹药采购费将从现行计划的约 1 万亿日元（1 日元约合人民币 0.051 元）增至约 2 万亿日元，将防卫装备的维护完善费将从约 4 万亿日元增至约 9 万亿日元。而在修订的《防卫力整备计划》中，日本将未来五年的防卫力费设定为大约 43 万亿日元，与之前的预算额相比增幅将达到 45.6%，其中 5 万亿用来构建远程导弹能力，未来还将再追加 4000 亿日元，用于量产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

近年来日本认为，《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和《防卫计划大纲》在对安全环境的认识方面有很多重复内容，应各自将重点放在“战略层面的安全环境和国家安全目标及其实现方法”与“对抗威胁的防御战略”上，同时基于实现“与美国战略文件体系的整合性”，提出要用《国家防卫战略》替代《防卫大纲》，用《防卫力整备计划》取代《中期防卫力整备

计划》，这一方面可以使安全防务文件更加规范，另一方面也表示其对安全战略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

## 二、强化“反击能力”实现禁区突破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日本政府不断渲染周边以及国际形势变化，图谋拥有所谓“反击能力”，即具有对他国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按照日本和平宪法的限制，日本是不允许拥有“进攻型”特别是对地打击武器装备的，这一点也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监督。例如，美国出售给日本的 F-15J 战斗机和帮助日本建造的“宙斯盾”驱逐舰，都不具备对地打击能力。但此次日本将拥有“攻击敌方基地能力”等内容写入 3 份安保文件，说明日本正在有意突破和平宪法对“进攻型”军事力量建设的限制。

据日本媒体报道，目前日本防卫省为拥有“反击能力”，正在研究远程导弹开发计划，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把陆上自卫队“12 式陆基反舰导弹”进行升级，一方面是增加射程，把该型导弹的打击范围延伸至 1000-1500 公里左右，另一方面是升级发射方式，通过研制海基、空射甚至潜射版本，使其既能从车辆发射架，又能由飞机挂载还能通过舰艇进行发射。

除了发展远程导弹外，日本政府还正在研究扩大陆上自卫队驻扎在冲绳的部队规模，组建“冲绳防卫集团”，成为所谓“西南诸岛防卫”的核心部队，不仅承担日本列岛的防卫任务，还声称一旦有需要，就使用“反击能力”对他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展对地区事务发起的主动干涉行动，来消除来自敌国的“威胁”。这些都是日本将安保政策由“专守防卫”向“积极进攻”转变的具体举措，也将会对日本当前的“专守防卫”原则构成重大挑战。日本考虑从美国引进 500 枚“战斧”巡航导弹，全方位强化进攻性战力。日本考虑从美国引进 500 枚“战斧”巡航导弹，全方位强化进攻性战力。

不仅如此，作为“反击能力”的运用手段，新文件明确五年内部署足够数量远程巡航导弹的目标。为此，明年起日本将从美国购入数百枚“战斧”巡航导弹，并对本国产的 12 式巡航导弹进行升级改造，将射程提升至 1000 公里以上，导弹部队由 5 个增至 7 个。巡航导弹的发射装置方面，除陆基发射和水面舰艇发射之外，日本还将研发列装可垂直发射巡航导弹的潜艇。就此，日本防卫相浜田靖一 12 月 8 日曾表示，潜艇具有极高的隐蔽特性，配合长射程的巡航导弹，可以大大提高应对难度。

为提升继战能力，日本政府在未来十年内将为陆上自卫队和海上自卫队新建 130 座弹药库，提高弹药补给能力；在未来 5 年内加大武器装备配件生产，解决装备零部件不足问题；立足发生战事的情形，日本将对自卫队设施进行加固和地下化改造，提高抗打击能力。

此外，日本还将着力强化网络、电磁、太空等新兴领域的攻防能力。新安保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将发展“能动的网络防御”能力，并确定了“使网络安全领域应对能力达到欧美主要国家同等或以上水平”的目标。

据此前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大幅扩编自卫队网络防卫队增至4000人至5000人，并布建数万人规模的外围网络人才队伍。分析人士指出，未来数年日本防卫力将在新安保文件的推动下得到彻底强化，这对日本及其亚洲邻国来说都不是一个好消息，东亚地区安全稳定形势将因此受到严重破坏。

### 三、无法掩盖对外军事扩张意图

作为一个受和平宪法限制、在二战时期发动过侵略战争的国家，日本加强防务力量尤其是“积极进攻”力量建设将会给东亚地区安全环境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因素。日本政府认为，由于受到《和平宪法》的制约，日本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因此几乎历届内阁都希望修改《和平宪法》，恢复日本的政治独立和防卫自主。此次日本通过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整備计划》，较为完整地形成了从战略层面到战役战术层面的安保文件架构，其最终目的就是以此整合和指导日本防卫力量，从而适应日本政府和社会对防卫力量建设发展以及日美同盟关系各方面的具体安排。

此次日本在修改的三份安保文件中，以面临“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为由，提出要在5年内把防卫费的GDP占比从约1%提高至2%以上，并提出首先要致力于加强日本自身经济实力、技术实力以及外交和防卫能力，包括研发、购买更具攻击力的高精尖武器装备，将增强“对敌基地反击能力”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这些都将实质性冲击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中“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的规定。尽管文书中表示，只有日本遇到武力攻击，被其他国家导弹攻击，在符合“武力行使三原则”时才会行使“反击能力”，但实际上各方声音都认为，这只是一种通过文字游戏变相拥有“宣战权”的做法，掩盖不了其对外军事扩张的意图。

为了更好地实现其军力扩张意图，日本还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积极扩大和发展与韩国、澳大利亚、东盟、印度等与日本共享普遍价值观国家的合作关系。近年来，无论是在美日年度大规模军演、美日韩反导军演，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军演中，都有日本自卫队的身影。而日本防务战略发生的改变，很大程度上与美国的纵容有关。自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继续大力推行“印太战略”，持续加大对“印太”地区的战略投入，有意通过联合军事演习高调炫耀武力，企图以此聚拢盟友伙伴，构建更高水平安全网络，从而维持在“印太”地区事务上的主导权。因此，美将日本视为关键棋子，试图将其塑造为战略竞争的桥头堡和

军事对抗前沿基地，逐步放开对日本的军备发展限制，甚至帮助日本自卫队提升战略进攻能力，鼓励日承担更多同盟任务，以弥补自身实力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此次日本大幅修改安保文件，实际上也是借配合美国“印太战略”深化强化自身防务能力建设，即一方面“倚美自保”，通过投靠美国增加“底气”；另一方面则“挟美自重”，借机推进军事扩张，在进攻性军事力量建设方面寻求突破。从未来发展来看，日本很可能会在这些新的安保文件的支持下，继续加强日美同盟合作，采取各种联合军事行动，从而使得两国在地区内联手滋事的风险不断增加，值得周边国家高度警惕。

#### 四、引起和平人士的广泛忧虑

日本重新走上军事大国路线，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与批评。16日，数百名东京市民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日本政府扩军。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古贺诚公开表示，文件中提出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完全脱离了专守防卫”，日本应避免走军事大国路线。日本反战和平组织“和平构想建言会议”15日发表声明指出，三文件将使日本再次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从而在东亚煽动军备竞赛，是极其危险之举。

日本《东京新闻》发表社论说，战后日本的防卫政策是根据放弃战争、不保持战力的宪法第九条制定的。自卫队装备仅用于本国防卫，不拥有攻击性武器，这是日本基于对战争的反省所作出的决定，也是日本不再成为军事大国的宣誓。日本政府修改安保三文件使日本严重偏离战后的和平主义国家轨道。

日本《每日新闻》的社论指出，在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巨额防卫费带来的沉重负担难以获得日本国民理解。获取“反击能力”并不能保护日本。日本应该与周边国家开展沟通，致力于军备管控，通过外交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据日本时事社报道，2022年12月16日，日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反对新“安保三文件”的游行，游行队伍举着反对军扩的标语，高喊坚决反对内阁决定的口号。参加抗议游行的东京都新宿区某男性教工表示，“反击能力”改变了日本的“专守防卫”原则。千代田区某女性公司职员表示，“反击能力”推高了战争风险。东京都港区某市民表示，不通过国会讨论，而是以内阁会议的形式决定，他对此感到非常愤怒。

2022年12月13日，日本长崎县的34个市民和平团体发表声明，指责新安保文件载明的“反击能力”违反和平宪法，并对此表示强烈反对。长崎原子弹受害者遗族会会长本田魂表示，日本政府不顾疫情和物价上涨，为筹集防卫费而提高国民赋税，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日本立宪民主党多数议员也对岸田政府发展“反击能力”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反击能力”极易被误认为“先发制人攻击”，主张日本应宣布“不首先发动攻击”。



韩国媒体不无担忧地指出，日本不认真反省过去的侵略历史，不断尝试打破和平宪法的约束，出台新安保文件大幅增加防卫费和强化防卫力，动摇和平宪法的根基，必然招致国内外的反对。国际舆论也指出，日本政府应认真倾听国内外的反对和担忧之声，尊重亚洲邻国的安全关切，在军事安全领域谨言慎行，多做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 日本半导体企业发展机遇及生存策略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尹 虎

当前新冠疫情的恶化进一步暴露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依赖少数制造商带来的巨大的风险。与此同时，中国、美国、欧盟、韩国也都在新形势下重新认识到半导体产业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和地区安全的战略性产业。中国新兴的半导体行业正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充足的人才储备、企业的大举投资推动下加速发展，进一步凸显加强对全球生产半导体的主要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战略研判的紧迫性。

日本政府基于对“失去 30 年的反省”和大国间强化半导体竞争的考量，于 2021 年 6 月 4 日由经济产业省出台了《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正式将半导体产业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加以重视，整体推进半导体研发、制造和基础设施完备，通过与国际产业巨头合作、投入巨额国家预算，欲将半导体作为下一代新兴产业加速复活。研究日本在半导体产业的战略布局与动向，能够为中国半导体领域在新形势下寻求突破性发展提供部分参考。本文

日本作为全球半导体产业链极为重要的一环，美国认识到日本在半导体材料和设备领域拥有极大优势，试图与其组成所谓的“半导体同盟”。在这种情况下，研判日本半导体国家战略的新动向，对于思考如何加速中国芯片自主发展和如何应对当前国际形势下半导体产业的激烈竞争等显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一、日本半导体企业迎来发展机遇

在中美对立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半导体产业在经济和军事两方面都成为战略物资，保持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已成为主要国家的课题。日本在半导体领域的份额仅占约 9%，低于韩国等企业，但在相关设备和材料领域，有很多产品占有全球最高份额。为了保持这些战略商品的竞争优势，日本如今的课题是在国内保持和扩大半导体的生产。

2022 年 5 月 21 日，日本自民党成立了半导体战略推进议员联盟。“半导体可能成为所有产业的关键点，不能光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待，还要从经济安全保障的角度来看待”，担任议员联盟最高顾问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这样呼吁在座的议员。

日本企业在制造方面落后于台积电（TSMC）等，设计也赶不上美国高通等。当前，半导体作为支撑数字产业的基础零部件备受关注，现在日本政界也在讨论振兴半导体产业。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材料。

在作为半导体基板的硅晶圆领域，信越化学工业和 SUMCO 两家日本企业占有全球 5 成以上的份额。SUMCO 会长桥本真幸表示：“晶圆是半导体中极其重要的材料。日本厂商技术领先，是日本的重要产业之一”。

在打印电路方面不可或缺的光刻胶（感光剂）领域，日本企业所占的份额也达到 9 成。JSR 及信越化学等企业占有优势。昭和电工等正在生产半导体表面研磨用的 CMP 浆料（研磨液），仅日本企业所占的份额就超过 4 成。

随着半导体需求扩大，日本企业也纷纷进行投资。信越化学 2022 年之前将在日本和台湾新建光刻胶工厂。投资额为 300 亿日元左右，台湾工厂的产能占 5 成，日本占 2 成。SUMCO 的桥本真幸也表示“已到了讨论从零开始打造工厂和销路的‘绿地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时代”，开始讨论建设新工厂。

日本在半导体的制造设备方面也很有竞争力。半导体的制造工序跟拍摄胶卷照片、成像的工序相似。智能手机和服务器使用的最尖端半导体要求精度达到纳米单位。蚀刻和显影工序等越来越重要。

日本调查公司 GlobalNet 的调查显示，仅东京电子在涂布显影设备上的份额就占到近 9 成。在清除晶圆垃圾及污物的清洗设备上，日本企业的份额超过 6 成。后工序设备的划片机方面，迪思科（DISCO）拥有 7 成份额。

东京电子在 EUV（极紫外）相关工序使用的涂布显影设备领域，是世界唯一的量产企业。每年设备的总供货量达到 4000 台，在利用数据帮助客户工厂改善开工率方面也在推进差异化。日本 SCREEN 控股在清洗设备领域占有 45.8% 的全球份额。在多达几百个半导体的制造工序中，总会产生微细的垃圾和污物，如果将晶圆比作棒球场，那么垃圾和污物就有一个杉树花粉那么大。该企业利用专用药液和纯水准确去除这些垃圾和污物，相关技术全球领先。东京电子为了支持最尖端的制造技术等，3 年内将持续投入研发（R&D）资金 4000 亿日元以上。东京电子社长河合利树认为，现在的盛况“只不过是（半导体市场多年持续增长的）Big Years 的入口”，将积极推进投资，以扩大份额。

技术趋势的变化也给日本企业带来了挽回的机会。最近备受关注的是之前附加值低的半导体后工序。后工序主要是指切片、布线、封装和测试等。过去，各半导体企业在前工序中竞争的是更加细微的电路。但也有观点认为，按照 1.5~2 年集成度倍增的“摩尔定律”，半导体性能呈函数进化了 50 多年，目前已接近技术极限。即使微细化停滞，只要能将多个芯片高效装入 1 个封装，就可以继续提高半导体的性能。东京大学教授黑田忠广指出，“这是在设备和材料领域占优的日本能够活跃的领域”。台积电将于 2021 年内在茨城县筑波市建设后工序材料研发基地，将与多家日资企业探索合作。

日本经济新闻在专利调查公司 Patent Result 的协助下，调查了后工序的代表性材料技术“多层电路”、“封装材料”的有效专利数量（美国，截至 2 月底）。与推进后工序技

术研发的台积电和英特尔一起排在前列的日本企业有信越化学、揖斐电（IBIDEN）及新光电气工业等。

实际上，从 2020 年秋季开始，世界半导体需求快速恢复，个人电脑及游戏机等使用的尖端半导体的后工序材料明显短缺。某国外半导体厂商的高管说：“由于日本厂商的基板短缺，有些产品无法量产”。在旺盛的需求下，揖斐电（IBIDEN）决定投资 1800 亿日元，增产服务器等使用的高性能半导体封装基板，还将在岐阜县大垣市的生产基地改建部分厂房，2023 年度开始量产。设备和材料作为不依靠微细化的技术革新推动力量，其影响力越来越大。能否产生新的机会，值得期待。

日本的东北大学教授远藤哲郎说：“我们想与国内企业合作，但没有找到合作对象”。他开发出了利用磁性将半导体耗电量降至原来百分之一的新技术。想在实用化方面寻找合作伙伴，但没有能量产的日本国内企业，最后与海外企业进行了合作。在设备等领域也将与国内企业合作，但很遗憾日本国内没有企业能制造。

## 二、命运迥异的日本半导体双雄：ELPIDA 与 RENESAS

日本半导体产业曾经出现过两家“新生企业”，一个是 ELPIDA（尔必达），一个是 RENESAS（瑞萨）。这两家企业成立时间比较晚，都诞生于 2000 年前后，另外还有一点非常特别，就是这两家企业都是“结合体”，都脱胎于三家企业（日立，NEC 和三菱电机），熟悉半导体产业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上世纪 90 年代，这三家企业都曾位列全球十大半导体企业。

作为日本半导体产业“寒冬”过后的产物，ELPIDA 继承了 NEC，日立和三菱电机的 DRAM 业务，而 RENESAS 继承了 NEC，日立和三菱电机的其它半导体业务包括汽车与消费电子解决方案，手机以及个人电脑周边。可以说虽然是新生，但是这两家企业继承了日本半导体三大巨头的核心资产，人才以及设备，几乎囊括了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半壁江山。不过出身和经历相似的日本半导体双雄，结局却完全不同，ELPIDA 以破产而告终，RENESAS 则幸存下来。

“ELPIDA”和 RENESAS 不但出身相同，而且都曾陷入经营困境。2008 年的金融危机重创全球半导体产业，DRAM 价格大跌，ELPIDA 陷入巨额亏损境地。同样 RENESAS 期间连续数年亏损，并在 2012 年创下纪录的亏损。在整体产业环境不景气的背景下，日本相关方面出手，对两家企业提供了援助。不过这个时候就能看出差别，对 ELPIDA 的出资大约为 300 亿日元，而给 RENESAS 的出资高达 1400 亿日元，这还不包括丰田，本田等日本各大汽车公司的援助额。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区别对待？从两家企业的雇员数量来看，ELPIDA 破产前员工总数为

5900 人左右，而 RENESAS 员工数量高达 4.2 万人，RENESAS 在日本拥有 19 座工厂，其车用 MCU 市场份额超过 40%，是丰田，本田以及日产公司的核心供应商。如果 RENESAS 倒掉，势必撼动日本庞大的汽车制造业，这是日本三大汽车企业所不愿看到的，简单来说，RENESAS 是一家大到不能倒的企业。

当然，除了外部因素，两家企业面对危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ELPIDA 是在 2012 年破产，此时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之前 DRAM 的主要市场来自个人电脑等产业，而随着苹果 iPhone 手机的热销，智能手机时代的大门已经悄然打开，DRAM 新一轮的市场周期即将到来。ELPIDA 如果能多坚持一年，甚至半年，情况都可能完全不同。ELPIDA 未能预见到这种趋势，遗憾地倒在了黎明前。而 RENESAS 则要幸运得多，不仅得到了日本汽车界的支持，像佳能，松下等电子巨头也都在出资之列。尽管 RENESAS 同样陷入危机，不过由于拥有丰富的产品线，涵盖了 MCU，液晶面板驱动 IC，PC 及家用多媒体 SOC 等众多领域。相比 ELPIDA，RENESAS 生存的几率更高一些，因为产品的多样化使它具备了更强大的抵御风险的能力。

不过，对那些利润率较低的业务，RENESAS 还是果断地选择了放弃，包括液晶面板驱动 IC。事实上，当时 RENESAS 的中小尺寸驱动芯片业务在全球的市场份额达到 30%。RENESAS 还相继出售，关闭了许多成本高昂的晶圆工厂，19 座晶圆工厂（其中包括 10 个负责前道制程的晶圆厂）中将近半数被关闭，保留下来的包括 6 家前道制程晶圆工厂和 5 家封测工厂。从营收规模来看，到 2016 年，仅相当于巅峰时期 2010 年的一半左右。可以说，为了生存 RENESAS 几乎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

经过持续多年的努力，RENESAS 逐渐转型为一家轻资产企业，一些先进工艺节点像 28nm 只能外包给台积电等专业晶圆代工厂。当然，这种结果也是日本半导体产业始料未及的，日本晶圆制造工艺逐渐落后于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曾经承载着复兴重任的日本半导体双雄，一个倒在黎明前，一个虽然“大到不能倒”得以留存，但是也已经泯然众人。

### 三、新一代半导体新企业 RAPIDUS

2022 年 11 月 11 日，日本以实现新一代半导体国产化为目标成立的新企业 RAPIDUS（快速）正式启动。该公司由丰田汽车和 NTT 等八家企业出资，目标是 2027 年量产。目前，日本在经济安全保障方面最为重要的半导体生产上依赖中国台湾地区，出现了地缘政治风险。虽然国产化势在必行，但 2010 年代日本并未投入资金进行最尖端产品的开发，在国际竞争中败给了对手。RAPIDUS 社长小池淳义表示，这家新企业是日本挽回空白 10 年的“最后机会”。

新公司 RAPIDUS 计划在 10 年内投入 5 万亿日元（约合 350 亿美元）进行设备投资等。

八家企业共计出资 73 亿日元（约合 5110 万美元），日本政府也会提供 700 亿日元（约合 4.9 亿美元）的补贴。社长小池淳义之前担任美国西部数据公司日本法人的社长。会长由东京电子公司前社长东哲郎担任。

日本将推进国产化的是对汽车自动驾驶和人工智能（AI）起到“大脑”作用的新一代逻辑半导体。半导体的电路线宽越小，性能越高。RAPIDUS 的目标是 2027 年实现 2 纳米（1 纳米为十亿分之一米）产品的国产化。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台积电）和韩国三星电子有限公司已确立 3 纳米产品的量产技术，还计划 2025 年量产 2 纳米产品。小池社长提出计划称，将确立 2 纳米产品的制造技术等，“五年后在日本实现最尖端产品的代工”。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半导体产业由国家主导，日立制作所及 NEC 等综合机电厂商具备了较高的竞争力，80 年代后半期日本企业占据了 50% 的世界份额，日本产品曾席卷全球市场。但由于日美贸易摩擦导致出口受限等原因，日本企业的盈利能力下降，韩国、中国台湾企业的实力迅速提升，同时日本也失去了开发和量产尖端产品不可缺少的投资余力。由于未能跟上 2010 年代呈现出白热化的电路线宽微细化投资竞争，日本出现了近 10 年的技术空白。三星和台积电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也坚持进行巨额投资，甩开了日本制造厂商等竞争对手，建立了高收益商业模式。

日美将半导体视作经济安全保障的关键。日本政府和执政的自民党已转向由政府主导推动国产化的方向。自民党于 2021 年 5 月成立了讨论半导体战略的议员联盟。日本经济产业省也紧跟着于 2021 年 6 月制定了“半导体战略”。

日本在取得吸引台积电工厂落户等成果的同时推进的是以美国为合作伙伴的尖端产品开发构想。2022 年 5 月，双方达成了以强化半导体供应链等目标的半导体合作基本原则。通过此次成立 RAPIDUS，日本的一系列半导体政策得以大幅推进。日本经济产业省一名官员严肃地说，“成败在此一举”。

围绕半导体，日本过去也有很多投入政府资金的企业和振兴策略的失败案例。2000 年至 2010 年代启动的尖端开发计划大多没有取得成果。2006 年出现了由东芝、日立、RENESAS 科技（现 RENESAS 电子）成立代工企业的构想，日本政府也起了推动作用。不过，各企业步调不一致，半年就失败了。

此次新成立的 RAPIDUS 虽然汇聚了日本政府和企业的智慧，但出资的八家企业和政府等利害相关者很多。如果不能像拥有很强领导力的台积电和三星一样迅速做出经营判断，有可能重蹈覆辙。

半导体是电子产品的核心以及信息产业的基石，已经成为现代 IT 产业的基础并广泛应用于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不仅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更关乎国家安全。近年来，大国间的

竞争从经济领域迅速转向高科技领域，半导体更是成为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受此影响，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被搅乱，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修复、理顺全球半导体行业的供需配给。到 2022 年下半年，中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带动汽车消费强势回暖，对以芯片为首的半导体需求激增，“芯片荒”开始席卷全球，进一步凸显自主芯片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关注并借鉴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从国家战略高度重视半导体的做法与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政策和制度层面集中发力，不仅要解决“卡脖子”问题，更要解决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关注产业链与科学研究的关联性，须重视产业链前端和基础研究领域。日本正是意识到半导体产业的材料、性能和应用等全体系都不是“可山寨”的技术，从国家层面统筹将科技重心放在了“烧钱、烧时间、烧技术、烧人”的材料技术领域，其中发展产业链前端和基础研究领域更是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源，迫切需要从国家层面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 韩国文化软实力提升政策简析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 权承文

韩国文化软实力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各项政策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了政府推动“文化立国”等相关战略的实施，设立多层次的韩国文化软实力外交组织机构和不断完善文化发展的相关法律制度。韩国企业和国民的积极参与也是文化软实力发展过程中不可小觑的一部分，全社会的合力形成一套独特的发展模式，不断推进韩国文化软实力往新的高度发展。

中国和韩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地理、人文和文化关系。因此，研究分析韩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战略，对于我国文化建设路径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学习韩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成功经验，也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发展。

## 一、以政府为主导，推动“文化立国”战略

韩国政府提出“文化立国”战略，目标是将韩国打造成文化大国。韩国政府从此以主导的姿态推动“文化立国”战略发展，增强其文化软实力，从一开始到现在，韩国政府始终保持高度重视文化的发展。

政府主导顶层设计，通过中长期目标和计划来推动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如《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韩国 21 世纪文化展望》和《文化产业发展法》。随后，颁布了《文化产业促进法》，根据该法，对《广播法》和《电影促进法》等若干法律和政策进行了修订，以提供一个法律框架，确保文化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与此同时，韩国文化体育旅游部成立了文化产业局来监督文化产业，并成立了游戏总支持中心、游戏技术开发中心和游戏技术开发中心来支持和促进游戏产业的发展。并在 11 个城市建立了文化产业支援中心，建立了文化产业促进机制。2008 年，韩国政府组织法案被修订，成立了韩国政府组织法案。文化和旅游部、新闻和宣传部、信息和通信部以及知识经济部合并为文化、体育和旅游部。目前，该部有一个文化遗产局，11 个办公室和 52 个业务部门。

政府财政支持，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促进文化产业的顺利发展。资金来自于各种渠道，以促进文化产业的有序发展。韩国文化产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政府投资的振兴基金；政府和私人共同投资的产业基金；以及由私人资本组成的私人基金。韩国政府为发展文化软实力投入资金的事实表明，这是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今年，韩国政府已拨出 1



万亿韩元的文化预算用于发展韩国文化市场，目前韩国文化市场占全球 2.3 万亿美元的 2.3%。韩国政府计划在 2022 年前建立一个价值 4500 亿韩元的特别风险投资基金，以资助高风险、低价值的创新项目。据韩国文化部副部长金泳三称，该基金将专注于相对较小的内容类型，如出版和动画。韩国政府已宣布计划通过注入超过 1 万亿韩元的资金，将销售额在 100 亿韩元以上的中型内容公司的数量从目前的 1700 家增加到 2000 家。

政府主导人才开发，由于文化产业的快速增长和对相关专业人员的需求，韩国正在大力投资于综合人力资源培训，特别是在电影、动漫和游戏行业。它还将关注艺术方面的培训，并试图建立一个对艺术和文化产业都有利的人力资源开发系统。完善人才管理制度，在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的合作下，成立了 CT 产业人才发展委员会，以制定和协调各项计划。

## 二、多方合作——企业、国民共同参与

韩国文化软实力的高速发展除了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还有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其中包括从企业到国民的支持。韩国大型企业不仅是资金上支持文化发展，其本身在参与国际活动过程中也是国家形象的代表；同时韩国国民对本国文化的推动的作用也不可小觑，文化对外传播的前提是本国民众对本土文化的认可，这一点也是我国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不足之处。

大型国际企业在韩国“文化立国”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大型企业不仅推动了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还具有文化功能。跨国企业的企业文化离不开民族文化的传承，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是民族形象的一个缩影。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韩国最大的食品公司之一 CJ 集团在发现政府对电影和电视业的支持越来越多之后，决定成立一个娱乐部门。梦工厂在韩国、中国和香港的发行权。第二年，CJ 娱乐公司开设了它的第一家电影院“CGV”，它代表着“文化、伟大和活力”，它现在是韩国最满意的电影院。当时的制片人是朴赞郁，导演是庞俊浩。虽然题材比较严肃和小众，但国际演员阵容帮助该片在全球创造了 8600 万美元的收入，提高了 CJ 集团的知名度和盈利能力。

CJ 娱乐从 2009 年开始活跃在中国市场，投资了章子怡主演的《非常完美》和彭于晏主演的《分手合约》等影片，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14 年签署了中韩电影合拍协议，通过翻拍、投资和人才流动等方式进行合作；2015 年，CJ 娱乐投资了《重返 20 岁》，这是迄今为止收入最高的中韩合拍电影。同时，CJ 将几部韩国电影引进到中国，包括《雪国列车》和《狼少年》等，这些电影都受到了好评。2020 年，CJ 还将把中国的皮影戏带到韩国进行展览，并将韩国的 BIBAP 表演和传统节目介绍给中国。为了给两国的电影人创造互动机会，

CJ集团每两年在中国和韩国举办“中国电影节”和“韩国电影节”，许多中国和韩国的电影人和电影明星参加了这些电影节。此外，CJ集团每年为中国青少年举办电影对唱班、梦想音乐班等文化活动，并通过“中韩青少年梦想微电影展”促进中韩青少年的文化交流。CJ集团还通过“中韩青年梦享微电影展”促进中韩青年的文化交流。

除了政府和企业，韩国民众在发展文化软实力方面的作用也不能被低估。流行是文化的生命线，也是文化死亡和更新的一个必要因素，流行性是产生流行文化的基础，也是流行文化“走红”的标准和依据。韩国民众对韩国文化有强烈认同。韩国民众在韩剧的制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韩剧是“边拍摄边播放”，人们的创造力和意见在剧本中得到体现，从而产生了高质量的流行剧。没有观众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就不可能有韩国综艺节目的普及。音乐和舞蹈的制作，明星的创作过程与观众的感受密切相关。没有公众的支持，文化传播就无法发展。民众的力量被整合到韩国机构的运作中，创造了一个全民娱乐的社会氛围。

### 三、韩国文化外交多层次机构设置

承担软实力外交是一个主权国家外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政府机构在主权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共同推动软实力外交的发展。在这方面，韩国主要建立了国家品牌委员会、外交通商部及其下属机构、文化体育观光部及其下属机构、计划财政部等政府机构，在文化软实力外交过程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组织体系。

国家品牌委员会是由民间专家成立的，下设五个小组委员会（企划部、国际交流部、企业和信息部、文化观光部、全球市民部）和两个组织（政府及公共机关政策协议会和事业支援团）。2009年，国家品牌委员会与三星经济研究所合作，开发了一个国家品牌指标模型，涵盖经济、企业、技术、传统文化与自然和基础设施等领域，以更有效地评估韩国的国家形象。国家品牌委员会的成立大大增强了韩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

外交通商部也是管理韩国软外交实施的部门之一。它负责文化外交、外国媒体管理、官方发展援助和海外维和，还通过韩国国际交流基金会（KF）、海外同胞财团和韩国国际合作团（KOICA）参与与外国同胞的联系，这些机构都隶属于外交通商部。外交通商部负责文化软实力外交相关事宜，包括缔结文化交流协议、促进韩国研究、海外艺术展览和国家对外援助。

韩国国际交流基金会（KF）是负责韩国软实力外交的重要政府机构，代表政府积极参与海外软实力外交活动。其主要职能是在海外大学设立韩国语课程，组织论坛和讲座，创建支持项目，提供奖学金，并向韩国语工作者颁发奖金。韩国国际合作团（KOICA）主要针

对发展中国家，负责无偿援助和海外援助等任务，在韩国的文化软实力外交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通过与民间社会的合作提高韩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形象。

文化体育观光部负责文化外交、体育外交、媒体外交、网络外交和旅游推广。下设海外文化宣传院、国立国语学院和韩语世界化财团等机构，同韩国文化产业交流财团、世宗学堂、电影振兴委员会、韩国观光公社、韩国内容产业振兴院等共同推进韩国文化软实力外交的发展。文化体育观光部下设海外文化宣传院，集中管理韩国文化的海外推广工作。该机构有四个部门：规划和管理部、海外文化促进部、海外文化促进内容部和海外媒体合作部。主要活动包括促进韩国和国外的双向信息交流，开展文化讲座等海外活动，与大使馆和领事馆联络，以及组织与韩国有关的学术会议和研讨会。

此外，其他部委也在促进韩国的软实力外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教育科技部有国家国际教育研究所和韩国中央研究院，前者负责为外国人开办韩国学校，后者负责为海外侨胞开办韩国学校和韩国教育机构，培训当地外籍教师，以及在线学习韩国语言。后者负责派遣韩语教师，为外国研究人员和志愿者举办学术研讨会。所有这些部门都在为加强韩国的软实力做出卓越贡献。

#### 四、形成独特的法律体系

良好的法律环境对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韩国可以说基本建立了比较系统和成熟的文化发展法律体系，与此同时，也都是秉持与时俱进的原则，不断制定和修订文化相关法律法规，以满足文化产业当下的发展需求。这就意味着在给文化软实力发展提供保障的同时，还积极促进了文化产业向更高更好层次攀登。

以1999年《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的出台为标志，韩国进入了文化产业促进法的制定以及发展阶段。紧随其后，立刻修改了《电影振兴法》，并且于2002年制定了出版及印刷振兴法。2006年废除了之前有关音乐、电影及游戏的限制性较强的法律，并且出台了在游戏、电影、音乐等方面具有促进作用的相关法律。2007年还从出版及印刷振兴相关的法律中，分离出有关事项，制定了《振兴印刷产业相关法律》。以上法律的出台和完善，使韩国文化产业相关法的框架初步完成。

自此以后，韩国文化产业促进法在逐渐完善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内容产业振兴法》为基本法，以《振兴音乐产业相关法律》《振兴电影及录像带产业相关法律》等为特别法的法律体系，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支持。

关于文化发展的基本法也有几十个，包括《著作权法》《大众文化艺术产业发展法》等。与此同时，韩国政府还制定了《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促进法》等政策性文件，

为文化产业的长期发展建立了明确的框架，并对其进行法律保护。此外，还对文化市场进行了规范，例如，引入了分级分类系统，在这样的法制环境下，整个文化产业体系更为完整统一，文化市场能更加有序地进行。这主要体现文化产业有了更高的自主权，既能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与税收优惠，其合法权益也充分地得到了保障，促进了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韩国的文化产业法律体系越发完善，涵盖了电影、游戏和音乐等多个领域，并根据文化产业现阶段的发展情况进行了适当调整，以确保文化产业的顺利和健全运作。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法律制度相辅相成，共同进步提升。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化产业法律体系还不完善、不成熟，缺乏权威性和制度性，涉及领域不全面、不细致，在新的领域还存在很多法律空白和盲点，产业发展进程缓慢，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不良因素的影响。

中韩同属东亚文化圈，韩国文化软实力的成功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研究分析韩国文化软实力战略，以及韩国发展文化软实力的举措，尤其是韩国在发展过程中的特征，可以看到我国在发展文化产业时的问题和不足之处。

我国今后需要进一步明确文化立国的战略目标，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体系；从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充分发掘优秀文化，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品牌；还需在政府引导下，实现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和有效合作机制的构建，高效促进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此外，我国有必要大力推动文化外交，向海外推广中国优秀文化，将中国的优秀文化和发展理念带给世界。

## 学术动态

# 第二届天台学“天台与东亚世界”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成功举行

2022年10月29日至30日，由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与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天台山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主办，浙江工商大学东亚佛教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天台与东亚世界：第二届国际天台学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台州市成功举办。

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工商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山东大学、苏州大学、四川成都大学、国家图书馆、山西省社科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南京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台湾省南华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台州学院、青岛大学、浙江师范大学，以及日本佛教大学、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叡山学院、日本立正大学、日本郡山女子大学、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日本大谷大学、韩国僧伽大学、新加坡佛学院、英国爱丁堡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及研究机构的40多位中外佛学研究者与会。受疫情影响，本次研讨会采取“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10月29日上午，研讨会开幕式隆重举行。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院长江静担任大会主持。日本佛教大学前校长、福原隆善长老，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王颂教授，天台县统战部部长庞伟峰，天台县宣传部部长李欠勇，天台山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天台山护国寺主持月净法师等出席了29日上午的论坛开幕式并致辞。致辞中，发言嘉宾表

达了对与会专家的欢迎和感谢，同时寄托了对此次盛会取得圆满成功的殷切期望。

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 43 篇，分设 14 场小组发言以供学者汇报研究成果。与会学者围绕东亚视域下天台文化、思想、艺术、海内外影响等重点、热点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发表内容既有基于宏观层面的天台宗的历史考察，又有基于中观层面的佛教观、思想、哲学研究，也有微观层面的文献考据与中日天台思想的影响关系探讨。

整体而言，本次大会研讨兼具深度和广度，评委点评鞭辟而精到，学术氛围十分热烈浓厚，充分展现了天台和天台学作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与纽带的重要作用。其中，日本佛教大学福原隆善教授的论文在分析“佛的相好”与“智者大师以前的相好”的基础上，阐明了智者大师的相好观等核心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喻静教授的论文则聚焦牟宗三禅教纲要的“天台圆教配慧能禅”，探讨了禅教融通前提之下，慧能禅何以最为“圆顿”的意义所在，引起了与会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

2022 年 10 月 30 日下午，研讨会闭幕式上天台县政协主席卢益民，著名天台宗研究者朱封鳌先生，日本叡山学院学监桑谷裕显教授，天台山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月净法师，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主任王颂教授等分别代表会议组织方向与会人员表达诚挚谢意。

最后，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江静院长代表会议主办方之一作大会总结发言。她指出，天台山作为中国汉地的佛教中心，在中国佛教史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起到了向东亚世界传播中华文明的重要作用。此次盛会，正是天台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发挥东亚文化交流作用的重要表现。她期望，通过联合办会能进一步推进、深化与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天台山文化交流中心的合作，并以此来共同推进世界天台学研究的进步，促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世界文明交流与文明互鉴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信息来源：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网站）

## 中国政法大学成功举办 第五届“中国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

构筑东亚与中国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中国政法大学政、在过去的 10 年间召开了四次“中国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进行追踪研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条件下，2022 年 10 月 29 日举办了第五届“中国与东亚”国际学术研讨会，

以“东亚与中国：百年大变局下的大调整”为主题，续写新的华章。

本次会议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外交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日本山梨学院大学、韩国世宗研究所等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会议的主旨演讲包括三部分内容，来自外交学院的苏浩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贾文华教授，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的杰森·杨（Jason Young）教授分别以《“开放区域主义”的升华：从东亚整合到亚洲世纪》《欧盟域外制裁框架内的中欧关系》和《中新建交 50 周年：未来如何？》为题做了精彩的演讲。



本次会议分有六个议题。第一议题为“西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调整与东北亚协调”，学者们就东北亚和朝鲜半岛地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第二议题为“西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调整与中欧美关系发展”，就中欧关系变化在印太地区的影响、拜登总统的中国策略、中欧关系动态等内容进行探讨和展望。

第三议题就“俄罗斯及欧亚国家地缘态势变化”进行讨论，学者们以当代中东库尔德问题的变化与特点及其地缘政治影响、南亚国家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原因等为切入点进行主题发言。

第四议题为“西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调整与东南亚国家战略发展”，与会者主要关注“百年变局下的中美在东南亚的竞合路径探寻”、“印太战略下欧洲大国对东南亚政策的比较”、“RCEP 的生效与东亚务实区域主义的生成”等内容。

第五议题为“大变局下的全球价值链与国际关系”，主要讨论了跨国产业链中的企业

权力和国家权力、欧盟数字经济产业所存在的困境、中国与欧盟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关系、全球价值链分析视角下的中欧经贸关系、重大国际政治事件对世界经贸格局的影响等问题。

第六议题为“中国之治：经验及其对东亚之意义”，学者们就中国的治理经验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中国智慧。

本次会议设有研究生论坛，由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和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组成。论坛就日韩关系、东南亚局势和东盟内部关系、美国与大洋洲的关系、加勒比地区和北极治理的区域发展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信息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网站）

## 第 16 届东亚实学国际高峰论坛 在韩国成功举行

2022 年 12 月 15 日至 16 日，由韩国实学学会主办的“第 16 届东亚实学国际高峰论坛暨磻溪柳馨远诞辰 400 周年纪念”在韩国首尔及全罗北道扶安郡举办。会议主题为“危机时代，再思实学”。

中、韩、日三国实学研究专家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了研讨围绕着东亚知识人的作用”以及“东亚学术共同体的过去·现在·未来”等，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与会研讨，一方面总结以往东亚各地区应对危机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也从当前危机中重新思考实学的当代价值，探寻解决思路。

实学是一种以实体达用为宗旨、以经世致用为主要内容的潮流和学说。实学思想肇始于宋代，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它是儒家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理论形态，体现了儒学的经世理念和价值追求。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实学精神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原则，更是中国古代思想向近代思想转化的中介和桥梁。明清时期，发祥于中国的实学思想传入日本、韩国，被东亚各国所倚重，为近代东亚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东亚实学研究蓬勃开展，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都成立了实学研究会，共同组织开展实学思想与现代发展研究。30 年来，中国实学研究会积极联合、组织东亚国家实学界共同开展实学思想研究，形成了中、韩、日三国实学界团结合作的学术交流氛围。由中、韩、日三国实学会轮流召开、两年一届的东亚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十六届，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实学研究及学术交流品牌。据悉，第十七届东亚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 2024 年在中国举办。

（信息来源：网易新闻）

## 2022 年度东亚汉诗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2022 年 11 月 26 日，“2022 年东亚汉诗国际学术研讨会”于上海教育国际交流中心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和上海市国际比较文学创新团队主办。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 100 余位学者以“线上+线下”双重模式，围绕“东亚汉诗史”主题展开深入研讨。此次研讨会分为开幕式、平行论坛、闭幕式三个环节。

开幕式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严明教授主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查清华教授，延边大学原校长、资深教授金柄珉，北京大学中文系刘玉才教授、《文学遗产》孙少华副主编、日本福冈国际大学海村惟一教授分别向大会致辞。

大会主旨报告会分上下两场举行，由上海师范大学陈飞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李琳老师分别主持。第一场主旨报告中，浙江工业大学的肖瑞峰教授以“日本汉诗研究的演进脉

络与发展趋向”为题，立足于宏观视角关照整个日本汉诗发展流脉，指出以宏通视野关照东亚汉诗体系，形成全方位、深层次与多维度的研究态势，形成自足自洽的研究系统。多维度转换视角，处理好“文献之维”和“历史思维与现实思维”的关系。

第二场主旨报告环节中，曹旭教授以“俞樾《东瀛诗选》的意义”为题讲述了近代中日汉诗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东瀛诗选》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编选的规模最大的日本汉诗总结，作为中日诗学交流的桥梁开启了中日汉诗比较评论的先河。这是当时最重要的文化选择，是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华彩乐章。



本次研讨会自今年年初筹备以来，共收到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台湾大学及日本、韩国、越南的学者论文百余篇，经专家组审议评定，76 篇论文入选分论坛汇报环节。下午，研讨会分别围绕“日本汉诗”“朝鲜汉诗”“琉球汉诗”“琉球汉诗”4 个主题，设置 12 个平行论坛，依托腾讯会议平台同步进行研讨，线上线下同时观看人数达 1500 余人次。

山川虽隔，文心悠同。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倡导在东亚视域下进行国别汉诗研究，东亚汉诗创作有着共同的形式规范，但从不同民族文化土壤中培养出来的各国汉诗，还有着形同神异的诗艺之妙。正是这些丰富的同中之异，表现出东亚各国汉诗的独特魅力。珍惜、传承和研究东亚汉诗遗产，对于今日东亚社会的良性发展、东亚命运共同体的共建，皆有温故知新、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和独到社会意义。

（信息来源：上海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管理处网站）

## 《东亚经纬》征稿启事

《东亚经纬》是由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东亚研究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面向全国相关机构内部发行的学术季刊。

本刊以研究“东亚学”理论，探讨东亚地区热点问题，分析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走势，传递海内外“东亚学”研究动态及信息为己任，开设“观察与思考”、“名家访谈”、“学术动态”等栏目。

《东亚经纬》不仅是从事东亚研究的各界人士开展学术探讨和交流的平台，也是相关部门了解和认知“东亚学”领域重要研究成果的渠道之一。

为进一步提高《东亚经纬》信息质量和可读性，能够全面反映“东亚学”研究的现状，兹长期征集相关东亚的研究稿件。征稿要求如下：

- （1）稿件要求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内容充实，论证严密，语言精炼，资料详实；
- （2）稿件必须由作者（或合作者）完成，杜绝抄袭。字数以 2000—3000 字为宜，优秀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要求；
- （3）稿件中如有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际标准，尽量不用图表；
- （4）一般不使用注释，如有引文，可在引文后加括号，注明出处（按作者、文献名、期刊或出版社、年月顺序）；
- （5）附上作者简介，信息包括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联系方式等。

本刊收到稿件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阅，并通知作者稿件处理情况。稿件一经采纳，本刊将略付薄酬。

投稿邮箱：youno2014hz@mail.zjgsu.edu.cn

邮寄地址：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正街 18 号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邮编：310018）

《东亚经纬》编辑部

